

《黄帝内经》成书的西汉文化背景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 咸阳¹

張登本^{1*}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of *Huangdi Neijing*

Zhang Dengben^{1*}

¹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Shaanxi 712046

Huangdi Neijing was completed during the several decades after *Shijiand* before *Qilue*, whose main content draws from the medical achievements of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of Qin and Han Dynasty. What creates the profound impact on its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theories are the thoughts of this period, such as "Valuing life", "people", "Valuing Yang", "Valuing earth", "the Heaven theory",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important works of this period, such as *Huai Nan Zi*, *Chun Qiu Fan Lu*, *Shiji*. Even the astronomy, calendar and medical achievements of this period are the basic material absorbed into the theories of *Huangdi Neijing*.

Key Words : *Huangdi Neijing*; Completion of the book; Cultur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有黄帝时代说, 有战国时代说, 有秦汉时代说, 有西汉说, 有两汉说, 等等。近20年来更有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说, 确切地说应当是在《史记》问世(公元前91年)以后至公元前6年刘向《别录》完稿的近百年期间应当是《内经》的成书时期。而此前近两个世纪西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尤其是医药科技)的发展为《黄帝内经》的成书创造了良好的相矣有利条件。因为任何重大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有其相关的特定背景, 更何况关乎到

中国人健康事业的《黄帝内经》成书这一重大事件的出现也不例外。

一、社会背景

就《黄帝内经》成熟的社会背景而言, 是西汉王朝在刚刚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不久, 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 西汉初期的统治者需要巩固这一成果, 但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和残余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殆尽, 这些思想和实力还深深的影响着西汉初期的统治阶层, 这也就是这一时期所奉行的“郡国制”的背景。封国制和郡县制并存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在《黄帝内经》理论构建中是有充分体现的。如《灵枢·师传》之“入国问俗”则反映了当时封

* 교신저자 : 中國 (712046)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咸新区世纪大道
陝西中醫學院 內經教研室
E-mail : zdben69@163.com Tel : 029-38185000
접수일(2013년 9월13일), 수정일(2013년 10월29일),
게재확정일(2013년 11월15일).

国制的社会背景,《素问·灵兰秘典论》则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统治阶层极力推行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烈意识。

西汉,又称前汉,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朝代,与东汉合称汉朝,是中国第一个强盛稳固的朝代。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自称汉王,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国号汉。这年的五月定都长安,西汉王朝诞生。公元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西汉王朝共经历了210年。汉高祖称帝之后,有鉴于秦亡经验,遂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又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以冶金、纺织为主的西汉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加之采用了和亲匈奴的外交政策,维持了边疆的和平。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大体维持和奠定了西汉帝国相对稳固、强大、繁荣、富有的基业。同时进一步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因此西汉早中期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国家是强大的、是统一的,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

《黄帝内经》的成书大约在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6年之间的近百年期间,虽然这一时间是西汉王朝逐渐由强盛走向衰落阶段,但是在“武帝盛世”以后又有“昭宣中兴”,由于继续奉行武帝晚年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政治局面重新稳定,国力得到恢复,成为西汉盛世的继续,延续了文、景、武三帝所创造的西汉盛世,这也为《黄帝内经》的成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像《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黄帝内经》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

二、文化背景

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医药学科也是一种文化。“文是基础医是楼”,以《黄帝内经》为主所奠定的医药学科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自然科学。因此,西汉时期的繁荣文化是《黄帝内经》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为其理论的

构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

(一)西汉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梳理研究,促进了《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

西汉时期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刻地整理和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家的代表著作《淮南子》全面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在以医言政、以医议事的理念之下,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内容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这就为《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西汉时期研究和梳理先秦诸子思想的代表作,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帝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的思想。从而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社会和统治思想状况。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在《黄帝内经》的字里行间中俯拾皆是。在这十家学术流派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糅杂于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构建医学体系[1]。各家的学术思想虽然自成其家,但却相互渗透,互相交叉,并不排斥。这种文化现象恰恰为《黄帝内经》构建自己的理论所利用。

(二)西汉重视黄老之学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黄老”是指老子和黄帝。《论衡·自然》中有十分明确的界定,认为“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所概括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新道家的学术特征,就是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具体言之,就是

“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学术特征。其中道家思想是其哲学基础，法家的观点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思想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可以说是吸收了众家之长，使各家之学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拾遗补缺和优势互补的效果，所以才能够产生“压倒百家”的显赫效果，成为西汉前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学术取向，既适应了当时为巩固中央集权迫切的政治需要，也符合了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大倡法治，适应了西汉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其集众家之长，则是百家之学经过充分的争鸣之后的必然归宿，同时也是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在学术思想中的反映和必然要求。这样的学术思想能够被汉高祖、窦太后，乃至文帝、景帝重视盛极一时并最终压倒百家，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黄帝内经》之所以在西汉时期成书，不能不与昌盛于西汉早中期的“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仅是将医学著作之所以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正如《淮南子·修务训》之“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而后能入说”之论，也有“黄老之学”所倡导的“道论”“无为而治”等等理念直接影响着《黄帝内经》理论的发生。仅仅就“道论”而言，《黄帝内经》将“道”这一范畴引入医学领域之后，全面广泛地用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在269次“道”的应用中，几乎将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所有理论原则和相关规律都纳入到“道”的范畴。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全面引入并构建养生理论[2]。

(三) 西汉“民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由于连续实行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加之这近百年期间，国家无事，也无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民富国强的太平盛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就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以及通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

识，表达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黄帝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不能不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民本”思想在《内经》原文中也有体现，如“黄帝问于岐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始终。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灵枢·九针十二原》），这可以说是在《内经》中“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四) “重生”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一部《黄帝内经》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黄帝内经》的成书，这一思想一致连绵不绝。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国家的基石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这就是历代统治阶层重视“民本”的执政治国思想基础。《庄子·养生主》强调于民休养生息，《兵法·月战》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之说，《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及其成书的，所转载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体现。

(五) 西汉时期“天论”观点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何谓“天”？“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就给“天”这个范畴以明确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的内涵界定。如若用今天的语言予以表达，所谓“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规律，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等。《黄帝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的秉承了这一旨意，如仅仅就其中

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经》的《天年》《通天》等无不如此。在588次涉“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被赋予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内涵。

(六)西汉时期“重土”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

西汉时期“重土”的思想与其所处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故在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西汉帝国的主旨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作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就不足为奇了。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五行对》）。《黄帝内经》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於时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再如“平人之常气禀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为本，故人绝水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氣象论》）。“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五藏者，皆禀气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气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阴，必因於胃气，乃至於手太阴也，故五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於手太阴也”（《素问·玉机真脏论》）。这一在“重土”思想影响下构建的人体以脾胃为本观点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脏腑气血的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对疾病的治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李杲所创立的脾胃学派无疑是《繁露》“重土”思想的重要影响以及是脾“胃者，五藏之本”观点的延伸。

(七)西汉“重阳”思想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和成书影响

《繁露》在论述阴阳关系时强调“阳尊阴卑”，这种重“阳”的思想是全书的主旨，并以此论述夫妻关系，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夫人虽贵皆为阴”（《阳尊阴卑》）；论述君臣关系，认为“当阳者，君、父也”，以及论述天地万物的关系，进而得出“阴者，阳之助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在人》）的结论。《内经》及其缔造的医学体系秉承了这一时期“阳为主

阴为从”的重“阳”理念，并将其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虽然有“生之本，本于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竭”，阴阳是“寿命之本”的认识，但是在这一时期“重阳”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其中的阳气是最为重要的，阳气在阴阳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论（《素问·生气通天论》），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对于生命活动十指关重要的，因此有“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之论述，并以太阳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为喻，用“薄厥”“煎厥”疔疮等常见病症为例，凸显人体阳气在生命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这一“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更其是明代“温补学派”创立的依据。

(八)西汉时期“天人相应”观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和成书影响

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黄帝内经》构建的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体现在这一医学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在西汉时期的思想界都十分重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如《淮南子》是在肯定天的客观性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认为“阴阳同气相动”，故“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观念，如“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本经训》）。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春秋繁露》也认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爱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妣而员，缘天容也；法，象星辰也；耳目戾辰，象日月也；口鼻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饱实虚，象百物也”（《人副天数》）。如果考察《黄帝内经》之“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

一岁，人亦应之”（《素问·阴阳离合论》）。“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膈，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阴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岁露论》的“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以及《素问》的《六节藏象论》《生气通天论》之“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有关内容之后就会发现，两者的精神基本一致。

三、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

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现存古文献之追述或世代传说及出土之文物，说明早在上古时期，劳动人民便逐步由结绳记事而过渡至以文字记事。故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之论（《易·系辞传》）。

（一）天文、历法

在天文、历法方面，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即有诸多此类记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不仅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论，如《史记》历书有天官书、《汉书》律历志与天文志等；而且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专著。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天文类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历谱类十八家，六百零六卷。说明该时期对天文、历法的发展，虽带有某些占星术及术数方面的唯心思想，但对天文与历法的研究，已达相当水平。现就其与医学有关的内容整理如下：

1. 天体结构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天体结构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种认识。

（1）盖天说。《黄帝内经》借用了盖天说这一宇宙的模式构建自己的相关医学理论，认为“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灵枢·邪客》），用以体现医学理论中“天人相应”观念的相关知识。还应用“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南方，阳

也，阴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凑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素问·五常政大论》）的盖天说的宇宙模型，阐述人类的寿夭与地域关系，用以解释人类的健康状况以及寿命的长短与这一宇宙结构之下的地域环境、气候变化的关系。何谓盖天说？之一学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可能起源于殷末周初。先秦时期有所发展，西汉时期趋于明确，故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天圆地方，道在中央”以及“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说，故有理由认为《黄帝内经》中与此相关的理论应当受西汉前期盖天说的影响。

（2）浑天说。“夫变化之为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帝曰：凭乎？岐伯曰：大气举之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这就是《黄帝内经》中运用浑天说的宇宙结构观构建相关理论的。何谓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这一学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后来又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这是朴素的地动说之先河。该宇宙结构观形成于先秦，于西汉时期已趋成熟，其观点详细地记载于东汉张衡《浑天仪图注》之中，认为宇宙“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该学说强调天体没有一定形状，亦非固体之物质造成，日月星辰均飘浮于太空之中，乘气而行，进退迅速，各任其情。可见，《黄帝内经》在其构建相关理论时收到了这一有关宇宙结构观点的影响。

（3）宣夜说。《黄帝内经》的“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

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素问·天元纪大论》），以及“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六节藏象论》）认识，应当说是接受了西汉时期先进的宣夜说，并且用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宣夜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卓见的宇宙无限论思想，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则已经有了明确表达。什么是宣夜说？这一观点认为，所谓“天”，并没有一个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正如《晋书·天文志》所记载，“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由此可见，宣夜说认为，所谓“天”，并没有一个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该观点是中国古代一种朴素的无限宇宙观念。宣夜说起源很早，汉代郗萌（公元1世纪）只是记下了先师所传的内容。此说认为天是没有形体的无限空间，日月众星自然浮行无限高远的虚空之中，依赖气的作用而运动。各天体虽然运动状态不同，速度各异，但都是漂浮在空中。可见《黄帝内经》相关理论的构建只能是在这一学说成熟的过程之中或者之后。

2. 二十八宿。

《黄帝内经》在构建相关医学理论时运用了有关二十八宿的知识，如运用了“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解释人体营气卫气昼夜循行规律（《灵枢·卫气行》）。再如为了运用“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苍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昂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阐述五气经天化五运的理论（《素问·五运行大论》）。在《灵枢》中引用二十八宿之名，已经达到完备阶段，与

西汉时期所言皆同。二十八宿是古人在天文学方面的重大发展。二十八宿亦名二十八舍。指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从历史文献可见，对二十八宿的宿数、星座及星名的最后认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文献如《尚书》《诗经》及《夏小正》中，提及星名较少。至秦、汉时期之文献中，则逐步完善。《礼记·月令》中已有记载但数目不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的记载较为完善。直至《淮南子·天文训》二十八宿有了准确的名称和在地球中的排列顺序。1978年湖北省清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二十八宿星数相同，惟用字取名方面有差异，说明二十八宿之数的最终确定，似应在战国末至秦代，而名称的最终确定应当在《淮南子·天文训》。从《内经》所用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排列顺序情况看，与此相关内容的形成不应当早于这一时期。

3. 五星运行。

五星指水、木、金、火、土五大行星，即东方岁星(木星)，南方荧惑(火星)，中央镇星(一作填星。土星)，西方太白(金星)，北方辰星(水星)。五星之名所见甚早，在《尚书》《左传》等都曾有记载，而记载详备，且又与五行相合，与五季(春、夏、季夏、秋、冬)相配者。《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均有比较系统的五行系列内容并将五方、五行、五帝、五佐、五执、五神、五兽、五音、五日予以组合。

在《素问·金匱真言论》之五方系列组合中，即含五星在内，与《淮南子》所列均同。《素问·气交变大论》关于五运太过不及之论述，亦皆及于五星。又该篇在论岁候之太过不及上应五星时，曾言及五星运行之逆顺、留守等情况。如云：“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应近则小，应远则大……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肖者瞿，莫知其妙，凶凶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微，示畏侯王。”说明《素问》中有有关五星运行之论述，不仅与《淮南子》《史记》等同，而且其以五星反应神权之占星术思想，亦颇相近。

4.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日月运行，亦名日躔(chán运行)月离。古人早已注意到日月的运行，并根据其运行的周期，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关于太阳运行一度，月球运行13.7/19度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已有记载，认为“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言的“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与此一致。王冰注：“日行迟，故昼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犹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昼夜行天之十三度余，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谓十三度外，复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可见此说亦源于西汉。

5. 九宫八风太乙游。

九宫之名最早见于《易纬·乾凿度》卷下，虽有多义，但主要是指术数家所指的九个方位。八风之名，久已有之，然称谓不一。如《吕氏春秋·有始》与《淮南子·坠形训》中的提法就不一致。然《灵枢·九宫八风》所言的九宫，则与后者之义相同，乃以四正四维之八方，与八卦方位结合，加之中央为九宫。故此太乙游说，疑当出自西汉时方术家或占星术者之手。

6. 正月建寅。

正月建寅，与历法相关。所谓“建”者，亦即月建，指历法中运用十二地支分别标记一年十二个月的方法。古代以北斗七星斗柄的运转作为定季节的标准，将十二地支与十二月相配，用以纪月。把每年的岁首正月，定位在斗柄（即北斗七星的1、5、7星）所指的十二辰中寅的时位。《淮南子》的作者，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书中有关“正月建寅”的历记方法应当与汉武帝于太初元年颁行的《太初历》是一致的。《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太初历》不仅是我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中，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历谱竹简，为秦及汉初采用颛顼历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至汉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颁行的《太初历》仍用四分法，改正月为建寅。在《素问·脉解》篇中就有“正月太阳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个月与十二辰全部标明，即寅者正月，卯者二月，辰者三月，巳者四月，午者五月，未者六月，申者七月，酉者八月，戌者九月，亥者十月，子者十一月，丑者十二月。从正月建寅而论，距离夏历相去古已远，很难影响到《内经》的理论建构，故与西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大凡《黄帝内经》中涉及到历法知识的内容，无论是正月建寅，还是置闰，还是24节气等等，无不受到这一时期有关历法知识的影响。

7. 二十四气、七十二候。

二十四气与七十二候是古代历法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关于二十四气之名，在今《素问》《灵枢》中，已言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个主要节气。关于七十二候之事，虽然没有提及具体名称，但《素问》中已言及“五日为一候”之说，按一年计之，说明七十二候之数已经确立。《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七十二候”及“二十四气”的问题，此乃我国古历法重要特征之一。关于记载一年中“候”“气”之文献亦较早，然其最终确立之名称及数目，则较晚，有些学者以为，在秦汉之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始有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各安插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八节。《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都是十二月纪的合抄本，这说明了前汉初年，还没有确定。24节气名称，但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不但有24节气的名称，而且其顺序、推算方法都很详细，现今通用的24节气名称及次序完全与之相同。一年分二十四气，大概是前汉初年以后，《淮南子》成书(公元前139年)以前。在《黄帝内经》的多篇都言及其中的四立、二分、二至八节名称与《淮南子》相同。可以确认《素问·六节藏象论》的有关内容应是在24节气与七十二候之名称及时序完全确立之后提出来的，应与该时期有关文献有称引关系[3]。

四、西汉主要文献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一)《淮南子》与《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

《淮南子》的出现全面影响了《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其中的“兼收并蓄”治经理念成为《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重要思路。秉承先秦道家宇宙观的本体论，认为宇宙万物同源于一气，气是宇宙万物生成本原，道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共同规律，在此大前提之下，也以“道”以“气”论述人类生命活动。在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之下解释相关现象，其中包括人类生命活动，这些内容都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有养卫生、病证、治疗，以及药物的内容，不但反映了西汉早期医药学成就，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医学理论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4]。

(二)《春秋繁露》与《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

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深受汉武帝的重视和推崇，82篇内容以《春秋公羊传》资料为基础，凸显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立场。他用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形体大致构造、某些生理机能、脏腑形体关系、形神关系的医学认识，言思想、言文化、言治国、言治事、言治人等等，其中宣扬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点，运用精气、阴阳、五行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治国方略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以及生命科学的等相关道理，除有专章讲述养生之外相关内容还散见于别章，较全面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的认识。作为影响汉武帝时期朝野思想的《春秋繁露》，也就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也可以从中窥视到此后成书《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相关背景。可以从中窥视到此后成书《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相关背景[5]。

(三)《史记》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书虽然晚于《史记》，但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仅仅29个医学案例约1.1万字的内容，就与《黄帝内经》在征引医学文献名谓、行文格式、问对体例、医学术语、精气—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疾病演变规律、“治未病”理念、“病人为治病之本”的观

念、用“整体观念”阐述医学知识、10岁的年龄段划分、重视“胃气”在疾病预后变化中的意义、“杂合以治”的治病理念等12个方面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其中所记载的医学信息，提示司马迁及其此后时代的医学成就已经为《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准备了充足的文化基础、哲学基础、思维基础、方法学基础，尤其是构建医学理论时所必须的临床实践基础。只要认真地研读其中的内容后就有一种可以从中找到《黄帝内经》的影子之感，紧随其后的几十年成书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6]。

五、西汉医药成就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先秦时期，是我国科学文化比较昌盛的时期，在医学方面，不仅有诸多名医著称于时，就医学文献而言，在当时定有诸多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流传于汉代，为王公贵族所收藏，有的为医家所得，则视为禁书。所谓“禁书”者，禁秘之书也。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就记载公乘阳庆传授给淳于意的医书有“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以及《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12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高后八年，淳于意已七十余岁，故其生当在战国末期，此记其“禁方书”为“古先道遗传”，必为先秦旧籍无疑。另外，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及《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古医书，《马王堆医书考释》认为是“秦汉以前的医学原著”。此后江陵张家山出土之《脉书》，其十一脉与马王堆《阴阳十一脉灸经》内容显系同一祖本，且原有题名为《脉书》。而淳于意得到的12种医书中就与《黄帝内经》征引的30部文献名相同或者相近。这8部相一致的征引文献分别占两部书征引文献的66.67%和27.6%[5]。说明《黄帝内经》在西汉时期成书时引用了这些先秦时期的医学文献并与之一脉相承。在《内经》的经络理论中不但沿用了《阴阳十一脉灸经》及《足臂十一脉灸经》两部文献有关五脏六腑所属11条经脉的名称及其基本循行路径，而且在《灵枢·寒热病》中有“臂太阳”“臂阳明”，在《素问》的多篇中将“太阳经”称为“巨阳经”等都与两本出土的帛

书提法相同；《灵枢·邪客》所论的“少阴独无输”就是讨论只有11条正经的道理，显然此处论述就与出土的两部有关经脉的文献有直接的关系；《灵枢·五色》所用的篇名以及所论的望色诊法内容无疑与其参阅所引书目中的《五色》文献有关；《灵枢·胀论》在论述胀病内容之后于篇中明确指出所引内容出自古文献的《胀论》。另外，《黄帝内经》中虽然只记载了13个方剂20多味药物，但却讲述了十分丰富的用药规律以及组方法度[7]，如对《黄帝内经》理论构建和成书影响较大的《淮南子》中同样也载有8首方剂20多味药物，这不能不说是与西汉时期及其以前临床中药学的成就有关。

总之，《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偶然事件，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也只有在这个中国第一个政治稳定，国民经济富庶，思想文化繁荣的西汉王朝的大背景之下发生。

【参考文献】

- 1, 张登本. 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2 (3) : 1~6.
- 2, 张登本. 内经的思考[M]. 第一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110~117.
- 3, 达美君, 张宁.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述考[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95, (11) : 3~6.
- 4, 张登本, 《淮南子》与《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2, 28 (4) : 1~8.
- 5, 张登本, 《春秋繁露》与《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2, (5) : 1~10.
- 6, 张登本, 《史记》与《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J], 医学争鸣, 2013, (2) : 5~8.
- 7, 张登本. 论《黄帝内经》的用药规律[J], 陕西中医函授, 1993, (2) 1~6.

